



舒芜口述自传

舒芜 口述 许福芦 撰写



人民文学出版社

舒芜口述自传

舒芜 口述 许福芦 撰写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舒芜口述自传/舒芜口述;许福芦撰写.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
ISBN 978-7-02-010066-8

I. ①舒… II. ①舒…②许… III. ①舒芜—自传 IV. ①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05945号

责任编辑 徐广琴 周墨西

装帧设计 柳泉

责任印制 王景林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北京铭成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298千字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 张 12.375 插页18

印 数 1—6000

版 次 2014年4月北京第1版

印 次 2014年4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0066-8

定 价 35.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前 记

我哪是值得立传之人？哪有多少可以入传之事？这里却有了一本我的“口述自传”，岂不滑稽？

事情是这样来的：部队作家许福芦君，1997年才相识。他熟悉猛将雄关、金戈铁马的题材，不知为什么对我的蠹鱼事业、苜蓿生涯有了兴趣，要写我的传记。我惶谢再三，他坚持再四，比赛韧性。终于我比不过，找了些资料给他。他认真看过，还不远千里，从北京到我的故乡安徽桐城，找了我的故家和我的母校等地访问摄影。将动笔前，他要我先谈谈平生大概。我谈了一点。他一听，主张就这样详谈下去，由他记录出来，便是“口述自传”。我一向不懂，许多自传，也是本人口述，别人记录的，并不标明“口述”字样；那么，特别标明“口述”的自传，究竟有什么不同？福芦作了许多解释，我还是不明白。好在只要我动动口，想来不会太费事，也就不求甚解地“口述”起来。我们从1998年开始，一章一章地进行，每一章至少都经过六个步骤：我口述录音；他写出初稿；我加工调整；他打印出清稿；我再作修补；他打印出定稿。共得十三章，算是完成，已经到了2001年，前后跨越三年。中间我因病因事，多有耽搁，拖泥带水地进行之中，更见出福芦的韧性。

本来，我平生经历中稍稍有点意思的，大概都写过回忆文章了，这里实在没有多少新材料。于是以意为之地发挥“口述”二字

的特点，散漫谈之，随时泛涉到有关的环境气氛、交游人事等等。福芦生于五十年代，听我这个二十年代生的人谈这些旧事，倒觉得新鲜，鼓励我就这样谈下来。

这部平凡贫乏的自传，对读者只有一个意义，就是看一个人是如何虚度一生的。我那些回忆文章将另有结集（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舒芜集》第八卷），本书读者会不会看到，有没有兴趣参看，都难以预料。我只声明一点：如果遇到，请参看那里面的一篇《〈回归五四〉后序》（当然先已收入论文集《回归五四》），是关于我虚度一生的思想历程的最完整的总结。凡是此传未说到未说清，而那篇说到说清了的，全以那篇为准。

这三四年中，福芦为此传花了大量时间精力。他的记录，在漫谈文体中尽量暗寓条理，在书面语言中尽量口语化，煞费经营。全书章节的分合与标题，都是他的主意。注释全是他加的。他的夫人汪晓莉女士始终协助，一次再次地打印；我的字十分拙劣潦草，她要很费大力来辨认。对他们两位，我要郑重致谢。绛云女士热心促成此传出版，我也深深感谢。

2001年5月13日，舒芜记。

目 录

前 记	1	
第一章 家世与童年	1	
第二章 从小课堂到大课堂	32	
第三章 离乱中的青春	58	
第四章 南温泉、白苍山	108	
第五章 劫后河山	162	
第六章 在黎明前	190	
第七章 解放了	214	
第八章 平静的日子不平静	251	
第九章 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问题	288	
第十章 狱里狱外	298	
第十一章 深渊	319	
第十二章 向阳湖畔	335	
第十三章 北京的金秋	359	
附 录 舒芜年表	380	
后 记	387	

第一章 家世与童年

我是安徽桐城人，姓方。人家一听，总说：“桐城方！名门。”其实，我家从祖父以下四房人在一起，一共大约几十间房屋，乡下还有几十亩水田，在桐城名门中要算最清寒的一家，平常日子还得节俭着过。

我的祖先原本不住在城里，是住在桐城乡下鲁硃山。“硃”是大壑的意思，古书上常常用来给山川命名。所以，鲁硃山就是我们桐城县的一个山区地名。解放后为了简便起见，一般就用同音字“洪”来代替，叫“鲁洪山”。

据说，我的祖先在鲁洪山地区以打猎为生，因而当地人又称我们是“猎户方”。这在旧社会显然有点看不起的味道，所以只是背地叫。当了面，就称我们“鲁洪方”，也叫“小方”。

所谓“小方”，是相对于另一家同姓不同宗的“大方”而言。“大方”住在县城，是“县里方”，也叫“桂林方”。那才是真正的桐城望族。

“桂林方”与广西的那个桂林并没有什么关系，它是从成语“桂林一枝”得名的。明末清初，我们桐城出的一系列姓方的名人，都是“桂林方”。比方说一代思想学术大师方以智，又比方说桐城派古文创始人方苞，等等。以前老是有人把我当成方苞的后人，其实不是。为这个我曾经专门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就叫《我非方苞之

后》^①，那里面作了详细说明，这里不多解释。

总之，我的祖先大概就是聚居在山野的一般平民百姓。说到这一点我很惭愧，多少年来始终没有机会去鲁洪山看看，只晓得我们“鲁洪方”宗族的享堂一直在那地方，不像桐城那些大姓，都把祠堂建到县城里，像“桂林方”的方氏宗祠就很堂皇。我们连“祠堂”也没有，只有“享堂”，而且还在乡下。可见我们是个小姓，过去讲起来好像还有点掉面子。

在清朝乾隆以前，桐城大小知名人士，姓方的里面没有一个是我们“鲁洪方”。后来到道光年间，出了个方东树^②，算是我们“鲁洪方”头一个在全国挂号的人。他是姚鼐的学生，是“姚门四弟子”之一。要讲辈分，离我还不远，与我的曾祖父同辈，但年龄比曾祖父大得多。我的曾祖父是他的远房弟弟，同时又是他的学生。

方东树在当时严格说起来，也谈不上有什么太大的名气。他一生著了很多书。比较引人注目一点的，恐怕就是《汉学商兑》和《书林扬觝》。《汉学商兑》竭力张扬宋学，攻击汉学，学术上并没有多少价值，但是倒可以作为清朝汉学与宋学之争的一份重要材料。方东树还有一本书，叫《昭昧詹言》，可以代表桐城派的诗论。科举时代士子都要作试帖诗^③，所以这本书有实用价值，因此也就相当流行。现在回头看清代的文学批评史，《昭昧詹言》还有它的一席之地。

我们“鲁洪方”第二个有些名气的人，就是我的曾祖父方宗诚。他字存之，号柏堂，师从方东树，也可以说是姚鼐的再传弟子。

我的曾祖父年轻时家里很穷，只是乡下的一个贫寒书生。但他跟后来成为“曾门四大弟子”之一的吴汝纶关系不错。吴是我们的同乡，也是寒门出身，清同治三年中的举人，第二年又中了进士，授内阁中书，很得曾国藩的赏识，就被曾留在他的幕府切磋学问。

不知是不是由于吴汝纶的举荐，我的曾祖父后来也随吴成了“曾幕”人物^④。

当然，“曾幕”人物有大也有小。李鸿章那么大的牌子，当年也是“曾幕”人物。我的曾祖父地位肯定没那么高，官也只做到一个小小的直隶枣强县知县，就在今天的河北省枣强县。他在那里当了七年县令，官职虽不大，却把学问做大了，成了全国知名的理学家，晚年与朱次琦、陈澧等人同受清廷的“五品卿”封衔。

我的曾祖父就是这样由“曾幕”起家的。他在为人治学方面，也很受曾国藩的影响。曾国藩虽然不是我们安徽人，可对桐城派的“中兴”却有很大功劳。吴汝纶出自曾门，当时号称是桐城派的殿军大师。吴对我的曾祖父极为欣赏。清朝末年他奉派到日本考察学制，回国后大发感慨，说人家日本都有人讲“柏堂学”，可叹我们自己倒没有人讲。他没有详细说出事实根据，也没有听到别人说过，但是这话在我的家乡流传很广，桐城人引以为荣。我们家族的人、特别是我的祖父，更觉得非常自豪。

我祖父对我的曾祖父是极为尊敬的，经常给我们讲他老人家如何如何了不起。我祖父是个诗人，又是本地知名的书法家，在他的一大堆图章里面，最常用的那枚印章，上面是六个字：“方氏柏堂季子”。可见他很以自己是曾祖父的儿子为荣耀。

那时候，我们家每年的正月初七，祖父都要像模像样地主持一个典礼，祭奠圣人。这个仪式极其肃穆，堂上要张挂历代圣哲的画像，正中一排主要受祭的圣贤，从孔孟开始，中间有哪些人物我记不清了，但最末一位永远忘不了，他不是别人，就是那位曾文正公曾国藩。至于自伏董马郑以至顾黄王^⑤等学者和屈宋马班李杜韩柳^⑥等文士，都只能分列左右两旁。

我们一般堂兄弟姐妹，从小都被圈在大家庭里生活，排行也是

按照大家庭的年龄顺序来。我们直接受祖父的教育很多，自然而然也觉得有这样一位曾祖父，真是很大的骄傲。还在很小的时候，我就有一个梦想，将来长大以后，要像曾祖父那样，当个有名的理学家。其实，现在看来，清朝一代，理学成就并不高，我的曾祖父在清朝的理学家里面，又远远不是第一流的。

曾祖父的著作倒是不少。有一套《柏堂遗书》，装满一个小书箱。记得我最初就是从里面抽出一本《俟命录》，读得津津有味。这是一本笔记，过去的理学家都喜欢写这种随笔似的东西，谈理学见解。那时我抱起这个东西来读，还很有点吃力，半懂不懂的，啃了很长时间，最后也没有读完，但由此却对理学真的产生了一点兴趣。于是，从那以后到处找理学书和一些“学案”之类来看。虽说是胡乱地翻看一气，倒也多少学到几个术语，像“天理人欲”、“人心道心”，像“研几格物”、“主敬存诚”等等，还晓得了有所谓“濂洛关闽^⑦之传”、“朱陆异同之辩”^⑧。

这么一来，我也耐不住了，想动手写点理学家式的笔记。先拿出架式，要标举一个什么字，以显示自成一家决心。标举一个什么字呢？想来想去想出一个“诚”字，可又觉得犯了曾祖父的名讳，不大合适。请教别人，也都说不行，我就只好放下这个“诚”字，再慢慢想，后来一直也没有想出来。

现在看来简直是儿戏，可在那时，我是极真诚的。我年年跟着祖父给曾国藩叩拜，在学习理学过程中，《曾文正公家书》、《曾文正公日记》也是常备常读，而且还遵照祖上的家训，躬行实践，希圣希贤，很严格地修养自己，甚至还打算也制定一个“功过格”，每天自我检查，言行善恶、功过是非一一在案，以警策自己，连“善念”、“恶念”都不放过，有点“狠斗私字一闪念”味道，真够单纯的。那时我崇拜没有见过面的曾祖父，也崇拜天天见面的祖父，还崇拜从小就知道是大大有名的外祖父，这三位前辈可以说是我小时候的精神

偶像。

我的外祖父马其昶，字通伯，在文章学问上的名气，清末和民初不论京城还是地方，都是叫得响的。他出身翰墨世家，明代的太仆马孟祜，清代汉学家马宗珩、马瑞辰等人，都是外祖父的祖先。到他这一辈，一直都很努力，在我的曾祖父方宗诚和吴汝纶门下求学，并且经吴汝纶介绍，到武昌求教于张裕钊。所以，早年的学问底子打得很扎实。

外祖父开始出名，是他三十一岁那年著了一部《桐城耆旧传》^⑨，接着就开始讲授经学，先到安庆藩司署讲，后来讲到庐江的潜川书院，最后讲到合肥的李鹤章^⑩家，名气越讲越大。他还协助吴汝纶办教育，曾经出任过桐城中学堂监督，也就是校长。光绪三十四年，朝廷诏举人才，安徽巡抚冯煦第一个就推举我的外祖父。就这样，他进京当了个学部主事和京师大学堂——也就是现在北京大学的教习。

我的外祖父是桐城派最后一个代表人物，很有影响。他在北大教古典文学，是所谓“旧派人物”。那是民国初年，严复当北大校长。后来蔡元培继任校长，大力改革，旧派人物许多都退出北大。到了袁世凯解散议会，实行专制，以御用的小参政院作点缀，拼命拉拢名流，我的外祖父也被拉进参政院，当了一名“参政”，这一点很被当时人不满。但是，袁世凯进一步要做皇帝，也有人来拉拢我的外祖父参加“劝进”活动，他还是坚决回绝了，理由是“区区非能事二姓者也”。于是他收拾行李回桐城老家。

1916年，也就是民国五年，我的外祖父又回北京。这一次是去应聘，当清史馆的总纂。大概他觉得在民国的机构里工作不属于“事二姓”吧，而且，旧朝遗民在新朝参加为旧朝修史，向来不算失节，于是，接受下来了。这个“总纂”并不是“总编辑”，一个清史馆

里面有好几个“总纂”并列,大约近似于现在的几个编辑室主任罢了。

不管怎么讲,已经到了民国,外祖父作为一个“旧派人物”,在北京这个文化圈里,还是不太顺心的。比方说我的父母在北京举办新式结婚典礼,他就来了一家伙,差点弄得大家不开心。

这件事说起来还是由陈独秀和胡适引起的。陈和胡那时都是大名鼎鼎的“新派人物”。胡适是安徽绩溪人;陈独秀是安徽怀宁人,与我们桐城紧靠在一起,陈家同我们方家又是世交,陈独秀的父亲与我祖父这一辈交往,而陈独秀本人则与我的伯父、父亲来往。

在我外祖父面前,陈独秀和胡适当然是同乡小辈。陈不用讲了,他的父亲同我外祖父也都有交情;胡适是皖南人,相距都不远。但是,陈和胡坚持的那套新的东西,我外祖父是肯定不以为然的。所以,听说我父母婚礼仪式的来宾中,有陈独秀和胡适这两个人,外祖父就坚决不出席。

这一下可麻烦了,我外祖父是女方家长呀,他不出席怎么行!没有办法,事到临头,只好让我的一个舅父作代表,出席我父母的婚礼。这个舅舅是我母亲的弟弟。让他担任女方家长的代表,实在是迫不得已,很不像样子。可见,那时新旧两派的对立还是蛮尖锐的。

但是,前些时候我偶尔在《胡适书信集》中看到胡适给陈独秀的一封信,很有意思。当时陈独秀在北京因为散发传单第一次被捕的时候,京城内外形成一个“救陈事件”,轰动一时。其间,我的外祖父也参加了救陈的活动,还出席了陈独秀出狱时的答谢宴会。这一点,体现出外祖父与陈家的道义之交,也看出我的外祖父对陈独秀其人的复杂感情。所以,胡适后来还专门向陈独秀提到这件事。

陈独秀一贯赞成激烈的行动。当时，北京有个《晨报》，很右，群众愤激之下，把报馆给烧了。陈独秀认为该烧，而胡适则说不应该烧，两人意见相左。因而胡适就批评陈独秀，说，你还记不记得呀，你被捕的时候，在救援你的人里面，还有桐城马通伯、姚叔节这样两位老先生哩。你出狱后的那个答谢宴会，人家也都来了，你看看人家的胸量，我们应当学学这种风度嘛。

外祖父大约是1928年左右离开北京回桐城的，1930年就去世了。他离开北京时，南京政府已经成立，北京已经不是首都，北洋政府已经不存在，清史馆这类的机构随之不存在，外祖父当然无须再留在北京了。他一走，他的一些儿女，原先直接间接以他为中心而在北京的，都纷纷南下。我母亲也在这时带着我和别的几家亲戚结伴回到了安徽桐城老家。可是，我的父亲却没有一同回去。

我父亲方时乔，字孝岳，后来孝岳成了通用的名字，这叫做“以字行”。他是我祖父的第三个儿子，1897年生。父亲小时候在家塾读书，后来又回到安庆进六邑中学。没读多长时间，就考到上海圣约翰大学附属中学。

圣约翰大学是教会学校，当时很有名气。我父亲在那里读完中学，又接着考上了大学，一直没离开圣约翰大学。他那时盯着这所教会学校的目的，就是想将来能去英国留学。圣约翰大学的主要优势就是外文教育很严格，因而从那里毕业，考去英国留学很可能方便一些。现在人们讲究去美国留学，看得很重，而那时最时兴的是去英国留学，认为留学只有到英国，才算是正宗出洋，是最高级的。

我父亲在圣约翰大学文科毕业后，到北京大学当了一段时间的预科国文讲师。北大曾经送预科国文讲师刘复、也就是刘半农去法国留学，我父亲去北大，也希望能得到类似的机会，后来不知

为什么没了这样的机会。

那时北大预科的实际水平是相当高的，学生底子都很厚，现在的本科也未必能赶上那时的预科。当时全国没有几所大学，北大当然是最高学府，能进北大学习，是相当难的，本科就得相当于今天的研究生水平。所以，到北大站讲台、当教授，是许多人想都不敢想的事。当时，有位教授讲“中西交通史”课程，上第一课，就有一个学生站起来，恭恭敬敬地呈上一部“中西交通史”的书稿，非常谦虚地“请先生指教”。可以想象，站到这么个讲台上讲课，没有点真东西，那哪儿行啊。

1919年，我父亲二十二岁，就来到北大教国文预科，相当不容易。预科学生里面有的岁数比他还大。当时胡适已经在北大教书，第一次见到我父亲，一面握手一面连连说：“真没有想到你是这么年轻！”其实那时胡适自己也不过二十九岁。大概也就是在这期间，我父亲同我母亲结婚了。因母亲随外祖父全家都在北京，婚礼也就决定在京城办。他们当然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自幼定的亲，但这个婚礼却完全是改良后的新式婚礼，基本上按照父亲的意愿操办，外祖父只是大体上认可，诸如内外宾客的邀请等等这些具体事，都是父亲一手办理的。

我父母结婚后不久，两人就从北京到了上海。我父亲在商务印书馆当编辑。大约1921年，父亲又到日本东京大学进修去了。这时母亲已经怀了我，便回桐城老家待产。我是1922年出世的。我父亲1924年从日本回国，在北京的华北大学教书。也就在这一年，母亲带着两岁的我重来北京，和父亲相聚。可是不久，父亲的生活中出现了另外一位女子，他和母亲的婚姻由此蒙上阴影，并开始正式分居。父亲另行组织了家庭，离开了我们。这样，母亲带我回桐城时，父亲也就没有同行。那年我大约是六岁，已经在北京府右街的培根小学念书了。

从那以后，直到1973年我父亲去世，四十多年间，我们父子基本上没有相聚，中间有两三次相见，时间极短，加起来大约不超过二十天。但是，抗战以前，解放以后，特别是“文革”后期，我们经常通信。他和母亲分开后，一直在北平华北大学、沈阳东北大学师范学院、上海圣约翰大学、广州中山大学教书，在中山大学教书的时间最长，前后两度加起来一共有三十年。解放前他出版的著作有《中国文学批评》、《中国散文概论》、《左传通论》等，解放后出版有《尚书今语》、《中国语音史概要》等。他出的第一本书却不是中国文史方面的，而是他编译的一本《大陆近代法律思想小史》。我一直没有见到这本书，我母亲对这本书的印象却很深刻。她不止一次深情地向我回忆父亲，叙述他们新婚不久，父亲躺在躺椅上手捧英文书，口念中文，母亲坐在书桌旁作笔录的幸福情景，母亲经常在我面前回忆这些旧事，也包括我从出生起的整个童年时光。她一讲起来就非常投入，我自然听得津津有味。

听母亲讲，我出生后只有几个月，就得了急性肺炎，那时也叫惊风，严重得很，差点就送了命。当时，县里稍微有点手段的几位名医，都请到了，看过病情都不肯开药方，认为没救了，家里甚至连小棺材也准备好了。最后，请来一位“小周四先生”。他的医道一般，声誉也不怎么高，家里抱着“死马当着活马医”的态度，让他试试。没想到，这一试，倒碰上了运气。他开服中药灌下去，竟有了转机。接着就吃他的药，很快病情大减，把我救过来了。一家人都认为我命大。

母亲那时只有二十五岁。我的病情可把她吓坏了。我那么点小，病又那么重，横看竖看不见效，她又急又怕又伤心啊。不难想象，所以我的病一好，她就把我许给“小周四先生”当义子，报答人家的救命之恩。可惜我除了后来听母亲念叨过这位救命恩人之

外,到现在也没见过“小周四先生”。

我身体基本复原后,母亲就抱着一个襁褓小儿重返北京。从这时开始,直到我六岁随母亲又离开北京回到桐城老家,我幼童时期的许多回忆,都跟北京联系在一起。

那是1924年到1928年之间,正好是北洋政府统治的末期,我的外祖父以桐城派大师的身份,住在京城,而且顶着许多头衔。这样,以他老人家为中心的马家大家族,也都跟着在北京安顿下来。他的几个儿子和包括我父亲在内的几个女婿,还有女儿,也就是我的舅父、姨父之类,都在北京。另外,我还有两位伯父和三位姑父,这时也在北京居住。

印象中,我们在北京好像挪过好几个地点,具体是哪几个地方,记不清了。只记得最后一处,是府右街。记忆中有个晴朗的下午,一位长辈亲戚到府右街我们家来,给我买了一个小皮球,我不会拍,他就拍给我看,看得我着了迷,老以为皮球不是自己跳上来的,而是拍球的人手上有什么奇怪的引力,把球硬吸上来的。这想法伴随我很长时间,找不到答案,还傻乎乎地问过人家好几次,多半逗得别人一笑。我得不到答案,反倒攒了一肚子气。

在府右街北口路西,有一所培根小学。大约在五周岁时,我被母亲送到这所小学读一年级。如今回忆起来,别的课有些什么内容,都记不大清了,只有语文课还有印象。第一课的课文好像是“狗,大狗、小狗,大狗叫,小狗跳……”

我们每天放学,都是排着队、唱着歌子回家的。那歌词我还记得这么几句:“功课完毕太阳西,收拾书包回家去,见了父母行个礼,父母见我笑嘻嘻。”这么多年过去了,至今我还依稀记得我排在队伍里往家走的情形。一个小小的队伍,在府右街路西人行道上由北向南,慢慢过去。这时候,路东人行道上照着夕阳,望着那些夕阳下的老墙,心里有点欢快,全都沉浸在歌声里面。我还记得当

时最要好的两个同学，一个叫黄森林，另一个叫王玉同，长什么模样已经记不清了。倒是当年级班主任的那位女老师，还能记得住长相，但她叫什么名字，却又想不起来了。

有关北京的一些其他记忆，都是零零星星的，也模糊不清。什么看“扁担戏”呀、在北海坐小游艇呀，以及生了病吃药打针呀等等，都是一片混沌。能够最清晰地回忆起来的，那还是我的母亲。

母亲在和父亲已经分居生活的情况下，却还常常带我去看父亲。每次去时，那位与父亲一块生活的女子，也都坐在一起谈天，母亲似乎谈不上嫉妒，大家都在一起，说说话，有时还吃一顿饭，而后母亲带着我返回。她就像平常走亲戚一样，平平淡淡。

母亲对父亲没有半点责备的意思。当面是这样，背后也是这样。她还时常在我面前一遍一遍地说父亲怎样怎样好，连过去他们在一起拌个嘴、闹个别扭这样的生活细节，她也谈得津津有味，好像彼此之间哪怕是吵架，也都是值得留恋的。她有时说着说着叹口气，告诉我：父亲事事都好，就是有点任性。在她看来，父亲身上那些脾气性格方面的毛病，即便可以称之为缺点，也是能够原谅的，并且值得回忆，值得思量。

后来，我年龄稍稍大一点了，读书认字有点基本文化，母亲就督促我每月给父亲写一封信请安，报告学习情况，并且告诉我：父亲如何如何有才气、如何如何赢得家乡人的称赞等等，要我一定要好好念书，将来踏上父亲的脚后跟，成为一个父亲那样的有学问的人。

1934年，我父亲著的《中国散文概论》、《中国文学批评》两本书出版，他寄给我。我反复地读了，受益很大，可以说这是我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方面入门的两本书。1985年，三联书店还重新出版了《中国文学批评》，我写了长篇的序言。在半个世纪之后，我重读这本书，还认为它有相当高的学术价值，学术界的反应也都很好，